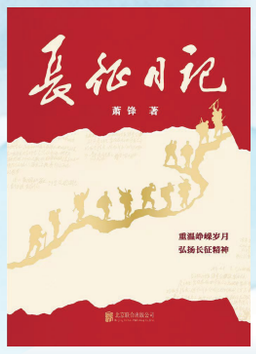
2026年11月9日 星期一 责编:刘颖 美编:曹磊 TIANJINDAILY 天津日报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把长征写在路上

江志平



《长征日记》,萧锋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3月出版。

有些历史,离我们很远;有些历史,却因为一个人的记录,忽然有了可以触摸的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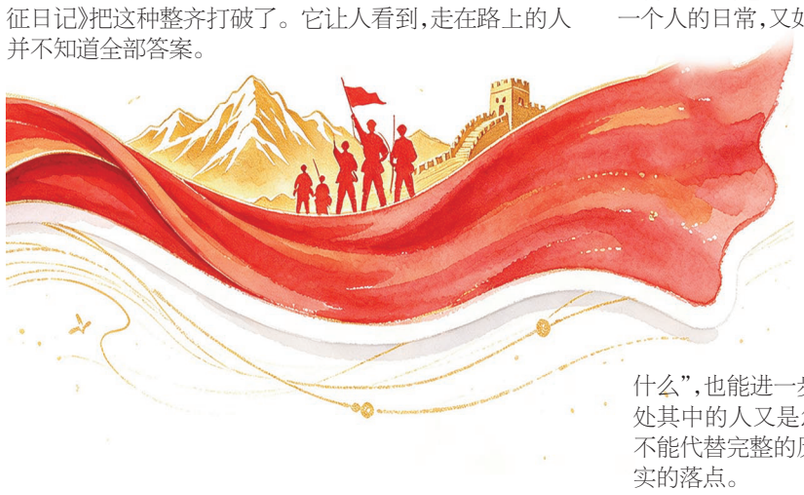
读萧锋的《长征日记》,常会生出这样的感受。它不是站在后来回望历史的高处,先给出结论,再铺陈故事,而是带着读者回到长征途中,跟随一位年轻战士的脚步,经过行军、战斗、饥饿与跋涉。历史不再只是地图上蜿蜒的路线,也不只是被反复提起的宏大词语,而是许多具体日子的叠加:今天走到哪里,明天还要往哪里去,身边的人是否跟上,队伍又将面对怎样的险境。

《长征日记》最可贵的地方,正是这种来自现场的真实。它让历史从抽象的叙述中走出来,让我们看见长征是怎样一天一天走出来的。

历史的重量,落在一个个具体的日子里

1934年10月,18岁的萧锋离开苏区,跟随红军踏上长征之路。这个年龄放在今天,还是少年;放在那段历史中,他已经要面对枪林弹雨、艰难行军和随时可能到来的生死考验。

“长征”二字,我们并不陌生。它常常与远征、牺牲、信念和胜利联系在一起,凝结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但当一个词被反复讲述,它有时也会变得过于整齐:路线清晰,意义明确,仿佛每一步都早已通向最后的胜利。《长征日记》把这种整齐打破了。它让人看到,走在路上的人并不知道全部答案。



前方在哪里?这支队伍要走多久?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这些问题,在当时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对于身处其中的年轻战士而言,长征首先不是一个后来被命名的历史事件,而是一段正在发生、必须一步步走下去的现实生活。

日记的力量,就在于它不急着替当事人总结。它把目光留在“当时”:在路上,在队伍中,在一次次出发和抵达之间。我们读到的不是一段已经完成的历史,而是历史尚未完成时,人如何继续前行。

这使《长征日记》具有了不同于一般历史叙述的节奏。它没有把困难轻轻带过,也没有让英雄只以一种面目出现。艰苦不是一个概念,而是行军中真实存在的消耗;危险不是后人总结出的章节标题,而是随时可能打断日常的现实。所谓长征,正是无数这样的日子连缀起来,最终成为一段改变中国命运的远征。

日记留下的,不只是行程,也是人的在场

萧锋自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起,长期坚持写日记。对于《长征日记》而言,这份记录习惯有着特殊意义:日记保存下来的,不只是一个人走过哪里,也是一名年轻战士怎样身处历史之中。

历史著作擅长梳理脉络,回忆文章常常带有多年之后的理解,而日记保留着另一种珍贵的时间感。它离事情发生的那一刻更近,留下的是当时的观察、感受和记忆。读者因而可以靠近那个具体的人:他不是后来被称为将军的萧锋,而是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正跟随部队走在艰险的路上。

这种“在场感”,并不意味着日记天然就是未经选择的全部事实。任何记录都有它的视角,也受书写者所见所闻的限制。但恰恰因为它保留了个体的视角,历史才显得不那么遥远。读者可以看到,宏大的历史如何进入一个人的日常,又如何改变他的生活。

萧锋后来成为将军,但读《长征日记》,我们首先遇见的不是一枚勋章,也不是一个被定格的身份,而是一个曾经年轻、曾经行走、曾经记录的人。这样的阅读视角,让英雄回到人的尺度。英雄并非生来就站在历史的终点,他们也曾在漫长的路途中,面对不确定的明天,承担当下的任务。

这也是日记作为史料的意义所在。它使后人不仅能够知道“发生了什么”,也能进一步追问:这些事情是怎样被经历的?身处其中的人又是怎样理解自己的处境?一页页日记虽不能代替完整的历史研究,却能让研究与阅读拥有更坚实的落点。

更值得珍惜的是,这些记录并非轻易得来。相关资料介绍,萧锋将军曾把日记写在大小、颜色各异的碎纸片上,再用针线订成册子。这样的细节令人动容。记录历史,并不总是在安稳书桌前完成;有时,纸片本身也要跟着人一起跋涉。那些写下来的日期、地点和经历,既是个人记忆的存留,也成为后人理解长征的重要线索。

真正的信念,不在抽象处,而在继续走下去

读《长征日记》,很难不想到“信念”二字。但这部书给人的启发,并不是把信念说成一句轻松有力的口号,而是让读者看见信念怎样进入行动。

对18岁的萧锋和他的战友们而言,革命理想并非遥远的目标。它与当时的选择、艰险的环境和对未来的盼望紧密相连。人在不知道终点在哪里时,仍然愿意向前走;在困难并未消失时,仍然承担眼前的责任——信念正是在这样的具体处境中显出分量。

如果只从结果回看长征,我们容易把胜利看作必然;如果回到当时,就会知道每一步都并不轻松。没有人能够提前替他们看见所有答案。历史的伟大,恰恰不在于当事人能够预知结局,而在于他们在充满未知的路上,依然作出选择、付出行动。

这让《长征日记》不仅是一部记录过去的书,也是一部关于“如何面对未知”的书。今天的读者当然不会重复长征的处境,但仍然会遇到自己的困难:事情繁杂,目标尚远,眼前的路并不总是清晰。历史并不是要人简单地把过去的经验搬到今天,而是提醒我们,许多看似遥远的精神品质,最终都要落实到日常的行动中。

伟大长征精神之所以能够穿越时间,并非因为它只属于某个历史时刻,而是因为它所体现的勇气、坚韧与责任,仍能照亮今天。对青少年读者来说,萧锋的经历让“坚持”不再只是课本里的词语;对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也让人重新理解,宏大的历史由怎样的个人选择构成。一个人的日记,不能写下所有人的经历,却可以为我们打开一扇门,让我们由一个人的脚步,走近一代人的远征。

在记录中,让历史继续抵达今天

《长征日记》把读者带回了那段尚在进行的路途。它让人看见,长征既有壮阔的历史方向,也有具体而漫长的每一天;既有信念的力量,也有普通人在艰难处境中的坚持。

那些写在路上的记录,让后来者能够重新接近现场,也让长征不只是一个被讲述的名字,而成为一种可以理解、可以感受的生命经验。

历史由人走过,也因记录而留存。萧锋写下的日记,穿过漫长岁月来到今天。它让我们明白:走向远方的路,常常始于脚下的一步,而值得铭记的历史,也正藏在那些没有停下来的日子里。

(作者为遵义市委党校遵义会议研究中心副主任)

长征路上每个人都在发光

王刚



《红飘带:那些长征路上的故事》,徐鲁著,红旗出版社2026年8月出版。

长征是一段写在中国大地上的壮阔历史,也是一条由无数普通人的脚步、选择与牺牲共同铺成的道路。读徐鲁的《红飘带:那些长征路上的故事》(以下简称《红飘带》),最先抵达读者心里的,未必是战役的胜负或路线的曲折,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渡口边点起篝火的老艄公,分出半条棉被的女红军,草地上递出旧草鞋的通讯员,还有那些年纪不大、却已经走在队伍里的“红小鬼”。

这部书以故事的方式讲述长征,没有把历史架在遥远的高处。它把镜头放低,让读者看见泥水浸透的草鞋、夜色里的渡船、风雪中的行军,也看见普通人之间的信任、照料与牵挂。长征由此不只是一个历史名词,而成为一段有人同行、有温度、有痛感的路。

从一簇篝火开始走进历史现场

《红飘带》的叙事,从长征前篇讲起。开篇“渡口的篝火”没有先铺陈宏大的背景,而是把读者带到一处江边渡口:夜色、江风、渔火,老艄公和细伢子守着一条小船。一个受了伤的年轻人深夜赶来,老艄公没有追问太多,先替他包扎伤口,又递上热水和烤白薯,最后把衣服和干粮也交给了他。

这个故事让人看到,历史的大门有时并不是被一声号角推开的,而是被一盏灯、一碗热水、一双愿意伸出的手轻轻打开。革命者奔赴远方,普通百姓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一个渡口、一艘小船,看似微不足道,却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有了真实的形状。读者会意识到,长征并非只有队伍在行进,也有沿途百姓的理解、帮助与守望。

这样的开篇,也确定了全书的叙事温度。徐鲁没有把故事写成冷硬的历史条目,而是从细节处落笔,让读者先进入人的处境,再理解历史的方向。书中“踏上征途”“万水千山”“雪山草地”“胜利会师”等篇章,串起了长征的时间与空间,而一个个独立的故事,则让这条道路不只是地图上的路线,更像一条由人情、勇气和信念共同铺就的长路。

小故事里藏着大历史的质地

“半条棉被”是许多人熟悉的故事。书中写道,三位女红军借宿在徐解秀家,看到乡亲家境贫苦,连一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她们便拿出自己的棉被,与徐解秀母子挤在一起过夜。故事打动人的地方,不只在于“分出半条棉被”这个动人细节,更在于它呈现了红军与百姓之间并非单向的关系:乡亲们生火、烧水、做饭、守夜,战士们也把有限的衣物和被褥送给乡亲。

于是,“军民鱼水情”不再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成为彼此照料的生活现场。人们在同一间茅屋里取暖,在同一张床上度过寒夜,也在那一刻建立起一种超越身份的信任。历史的深意,就藏在这样的相遇里。

“一双旧草鞋”则把读者带到大草地。一个十几岁的“红小鬼”草鞋被磨穿,脚掌被草刺扎破,伤口又浸在污水里。看护员试着用胶布包扎,通讯员也想把自己的旧草鞋给他。可通讯员要来回传达命令,脚上的鞋也已经破损。两个人都明白对方的难处,最后通讯员催促队伍继续赶路,自己还要往后面去。

这段故事并没有刻意拔高人物,却让读者看见了艰难中的相互体谅。没有充足的物资,没有轻松的选择,一个小战士的脚伤,一双旧草鞋的去留,都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所谓勇敢,并非感受不到疼痛;所谓坚强,也不是没有软弱和犹豫,而是在艰难中仍惦念别人,仍然尽力走下去。

书中的“让担架”“小小的篝火”“两个铜板”“一条珍贵的毛毯”等篇目,也都从具体的人和物写起。它们没有把长征简化成一串英雄事迹,而是让读者看到,伟大历史由许多细小而具体的选择构成:有人把担架让给伤员,有人把仅有的东西分给同伴,有人把责任扛在肩上,也有人在困境中照顾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一个故事或许只记录了片刻,但许多个这样的片刻汇聚起来,便构成了长征的精神底色。

把“红小鬼”放回他们的年龄

《红飘带》格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它让“红小鬼”成为重要的讲述对象。书中写他们观察地形、寻找野菜,写他们在行军途中遇到的饥饿、寒冷和危险,也写他们在艰难生活中表现出的乐观与机敏。

读到这些故事,读者会自然想到:他们中的许多人,按年龄来说还只是孩子。这本书没有把他们写成没有童年、没有恐惧的小小英雄,而是让人看见他们的年少,也看见他们如何在特殊年代被迫提前长大。正因为年龄被保留下来,他们的勇气才更显得真实。

这种叙述对青少年读者尤其重要。孩子读历史,常常先被人物吸引,再逐渐理解时代。一个“红小鬼”脚上的草鞋、一次草地上的险境,往往比抽象的概念更容易让他们记住:长征的路究竟有多难?那些年龄相仿的少年为什么能够继续前行?他们又是怎样在困难中关心同伴、承担责任的?

对成年读者来说,“红小鬼”的故事也提醒我们,不要把英雄仅仅理解为高大、遥远的形象。英雄也曾是少年,也曾饥饿、疲惫、受伤,也曾需要别人的帮助。正是这些真实的处境,让勇气不再是天生的光环,而成为人在一次次困难中作出的选择。

让历史可亲近 也让今天有所回应

作为一部面向大众、尤其适合青少年阅读的长征题材作品,《红飘带》的叙事清晰,篇章短而有故事性。它从长征前篇写到胜利会师,把重要历史节点融入人物经历,同时又通过“后记”回应长征的路线与精神,使读者既能读故事,也能逐渐建立对历史进程的认识。

这种写法让读者愿意走近历史,细节则让理解变得更深。一个渡口的篝火,连着革命队伍的出发;一床棉被,照见军民之间的情感;一双旧草鞋,带出雪山草地上的艰险与互助。读者由一个故事进入另一个故事,最终看到的不是孤立的人物,而是一支队伍如何在困境中前行,一群百姓如何与他们彼此靠近。

今天的读者当然不需要重走长征路,但阅读这段历史,仍能从中认识一种重要的生命经验:人在艰难中并非只能独自承受,彼此扶持可以让路走得更远;理想也不是悬在空中的词语,它要落实为对他人的关心、对责任的承担,以及面对困难时不轻易放弃的行动。

读完《红飘带》,留在心里的,或许不是某一个宏大的结论,而是那些具体的画面:暗夜里亮着的渔火,寒风中分享的棉被,草地上递来又被推回的旧草鞋。它们让我们看见,长征这条路上,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发着光。历史的红飘带,正是由这些微小却坚定的光亮,连接成了一段穿越岁月的远征。

(作者为遵义师范学院原副院长、教授)

“群龙得首自腾翔”是如何实现的

韩洪泉



《群龙得首——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罗平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10月出版。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时空,回望星火征途,在追忆和纪念中最引人关注、最值得铭记的,主要集中于事件、精神、人物这三个方面。事件是纪念的出发点,指向长征这一波澜壮阔的壮丽史诗本身以及其间发生的历史事件;精神是纪念的落脚点,指向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一根本要求;人物则是纪念的关节点,指向长征相关的历史人物(包括英雄群体),他们既是长征历史的见证者和创造者,也是伟大长征精神的熔铸者和传承者。罗平汉教授的新著《群龙得首——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聚焦长征路上如何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形成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主题,全面系统阐释了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逻辑,是一部站位高远、阐释精深、引人入胜、启人深思的长征主题力作和党史学习教育读物。

全面厘清“群龙得首”的历史脉络

长征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是一次战略层面的转移,也是一次绝处逢生的传奇。在极端的危境、困境、险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创造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终得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并以长征胜利为出发点,气势如虹、锐不可当地走向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正如书中所言,其中固然有很多的原因,但一个重要原因是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而党之所以能够成熟,首先在于党中央的成熟;党中央之所以能够成熟,就在于选择了毛泽东这样一个卓越的领导人。

书名中的“群龙得首”四个字,出自1961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朱德所作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组诗,其中《遵义会议》一诗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长征时期,特别是遵义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就在于,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事实上的主要领导人,也即“群龙得首”。长征胜利之后,中国革命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走向胜利的历史已经为人们所熟知。本书所要重点呈现给读者的,则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一步步实现“群龙得首”的。

邓小平曾指出:“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遵义会议前为什么“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在历史的激流翻卷中为什么在长征路上最终选择了毛泽东?书中以大历史视野切入并逐一剖析,历届中共中央在为中国革命作出过不同程度贡献的同时,也都曾犯过右倾与“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在此基础上,作者循着长征中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和革命实践之轨迹,全面梳理了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脉络,以遵义会议为主要标志,成功地实现了历史转折,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长征路上的中国共产党“群龙得首”,也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最坚强有力的保证。

生动呈现“群龙得首”的历史逻辑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13年多,但直到遵义会议前,其在总体上还处于幼年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一个革命政党的成长需要历史过程,领袖人物的成长同样需要时间的磨砺。历史呼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产生一个能克服各种弱点,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正确引领革命航向并取得革命胜利的掌舵人、领路人。长征路上,在对这种历史呼唤的回应中,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掌舵人、中国革命的领路人,“群龙得首”的历史逻辑,也体现出一种历史发展中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作者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停留于对历史过程的梳理,而是从多维度、深层次研究了“历史为何选择毛泽东”的历史动因。概而言之,历史之所以选择毛泽东,是因为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和综合考量之下,他最为适合中国革命的需要,最具有领导中国革命应具备的才华和能力。具体而言,书中从“顺应中国革命大势”“从战争学习战争”“‘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不公道’中磨炼成熟”四个方面作了详细考察和深入分析。这四点充分体现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辩证统一。作者指出,在遵义会议前的中国革命运动中,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家,但会打仗的革命家不多,尤其是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既能写文章做宣传,又能深入工农搞群众运动,还能打仗,同时具有理论家和军事家气质的,毛泽东是这不多的人中最突出、最杰出的一个。他在党内不是最早开展军事工作的,却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独立自主地开展武装斗争,最先深入农村组织动员农民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并由此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这在当时的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中是绝无仅有的。书中还特别提到,毛泽东在长征之前经受了一系列“不公道”待遇,这也促使他进一步走向成熟,同时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原则。长征路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这些情况都表明,经历了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工作方法、领导艺术上也进一步成熟,并日益成为一位合格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核心。

深刻揭橥“群龙得首”的历史启示

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这在长征时期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过程中得到了深刻的印证。揆诸史实,从遵义会议起毛泽东开始“管事”,局面为之一新。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一改之前的被动局面,跳出敌人重兵包围。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既坚决斗争,又讲究策略,最终实现了各路主力红军的大会师和长征的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推动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使长征的落脚点成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使被动进行的战略转移成为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通过历史的前后观照,遵义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面貌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不能“管事”,而遵义会议后则开始“管事”,并在事实上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长征是一段并未远去也从未远去的历史,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更是历久弥新的宝贵财富。作者以直白而深刻的话语叙述了阅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感受:“对于遵义会议前的内容,如一艘在惊涛骇浪中航行的船只,时起时伏颠簸不断;而遵义会议后的历史,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革命的航程中虽然并非完全波澜不惊,但不再有大起大落之虑。其实,船还是原来那条船,只是换了一个舵手。”从此,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主要领导人,遵义会议也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群龙得首自腾翔,确立核心启新航。正如本书前言中所指出的,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集体具备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崇高威望,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大势,校准中国革命的正确航向,制定切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打击主要敌人,从而最终赢得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历史雄辩地证明,党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的确立,对于红军长征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90多年前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轨迹,早已为此作了最为鲜活生动的注脚。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取得“两个确立”这一重大政治成果,成为新的长征路上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最大底气和最大保证。群龙得首才能腾翔冲天,党有核心才能领航致远。这也是我们今天回望长征所应获得的重要历史昭示。

(作者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